

2501

五华文史

资料第六辑



政协昆明市五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PDG

政协昆明市五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问：王润禄 熊 谦

主任：王晋云

副主任：苏健民 何兴庚

委员：高攀桂 胡 贵 卢 义 王树五
李志强 王 彬 赵从云

《五华文史》资料

主 编：何兴庚

责任编辑：赵从云

《五华文史》资料第六辑审稿人员

刘云舒	王晋云	王垂书	王润禄	熊 谦
杨建勋	李 坚	黄竹铭	范恒昌	程友德
周红宇	杜凤仙	刘旭华	高攀桂	程荣光
胡 贵	卢 义	王树五	李志强	何兴庚
赵从云				

目 录

- (1) 我从青年军退伍就学参加革命活动纪实……杨毓骧
- (17) 一次难忘的抗日慰问募捐演出……刘光武
- (19) “新联”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苏守义
- (24) 抗战时期昆明的“红灯笼”……陈长平
- (27) 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张多多
- (33) 可笑的“政治甄别”……张一飞
- (36) 解放前的昆明中华职教社……区党史研究室
- (47) 呐喊战斗的《民主周刊》……刘 志
- (61) 输入新学的《滇声报》……黄茂槐
- (67) 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尚志》月刊……巴 人
- (73) 回忆母校省立昆华小学……常 思
- (79) 由东大附中到云大附中……刘中兴
- (85) 我的国文教师作家刘澍德……陈润圃
- (91) 漫忆老校长李广田先生……蔡正发
- (96) 40年代的北门街……纪 勋
- (101) 消逝了的小巷——小西门城埂脚……张 翼

EC80/03

- (106) 回族名将赵钟奇将军……赵泽光 张世厚 赵从云
(116) 起义将领谢崇文事略……萧霁虹
(123) 近代京剧名人小志……石 阡
(140) 附片名医吴佩衡……李家祐
(146) 彝族诗人普梅夫……陈 明
(160) 李坤与张学智……万揆一

(169) 漫话民国昆明风情……王水乔
(179) 发展中的五华区残疾人事业……张科仁

(187) 附录……程荣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五华区
 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姓名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五华区
 第四届委员会机构设置

我从青年军退伍就学 参加革命活动纪实

杨毓骧

一、从杭州青中回到云南大学

1946年7月，中国驻印军辎重兵十四团，在南京退役后，我被国防部保送回云南大学文史系求学。当时我想在江浙一带补习高三功课，遂请求国防部重新安排在杭州青中高三攻读。同时函请云大保留我一年的学籍。

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为了培养一批知识人才，将青年军二〇一师至二〇九师的各师青年军学生大部份保送入大、中学校，少部份安排工作。同时还把青年军二〇五师的退伍学生安排在贵阳的青中、青职学校，二〇八师的退伍学生安排在嘉兴的青中、青职学校，二〇九师的退伍学生安排在杭州的青中、青职。与此同时各师又招收第二批知识青年补充青年军，这批青年军学生则在47年至49年之间，又被国民政府送上前线，充当炮灰。

1946年8月，我带上南京国防部给的入学证明书，到杭州，萧山县柯桥村青年军二〇九师退伍学生驻地报到，等待分派。二〇九师的士兵主要是闽粤籍，也有少数赣籍，约有

1500余人，我省驻印军学生则只有80余人。同年10月，青职校址设于西湖边，青中校址暂设在杭州城北，沿钱塘江边的六合塔古刹——云栖寺。

青中开学后，功课与普通中学一样，并聘请杭州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担任教员，校长是袁侠民。两三个月后，学校即开始克扣学生伙食，贪污校款，被我驻印军的同学发现后，带头闹学潮，搞罢课，吓得袁侠民躲于床下，事后被国防部查知，撤换袁侠民。1947年2月，国防部另委派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吴宝华担任校长，他带来一批教师，其中有位是云南籍的女音乐老师蔡翠善，她对云南同学十分关切。

吴宝华任校长后，加强对青年军学生的思想控制，发展三青团组织，煽动青年军学生参与阻挠杭州大、中学校的学运。另外，国防部又保送三青团学生80余名，插入本校，激起青年军学生的极大不满，大家提出三青团学生并未参加抗日，不能享受青年军学生的生活待遇。

1947年4、5月间，杭州学运蓬勃高涨，三青团学生更加嚣张，扬言要将青中八百个学生开进杭州城去镇压学运，此事被我驻印军学生反对。双方发生冲突，一个三青团学生公然拔出手枪威胁，我湖南籍学生熊波立刻从腰中拔出一颗美制松球手榴弹高呼同归于尽，险情被阻止后，由于得到二〇九师同学和体育教官陈泽耕的暗中支持，学校当局和三青团学生再也不敢提出镇压杭州学运的主张。

在青中时，我曾邀约几位爱好文艺的同学，自发地出了一个《诗与散文》的墙报，刊登了原中山校友倪寅、张嘉龙在衡阳军旅写的《暴风雨之夜》、《小兵的目标》等，我写的《苦难的村庄》、《蓝伽月》等，大都反映中、印人民的

生活苦难，墙报连出两期后，被校方警告停刊。

1947年6月期考过后，我再赴南京国防部要求发给返昆旅费。国防部以已发为由，不再重发，我只好向在上海求学的保山等处学友求助，于同年7月返昆，9月初到云大注册，进入文史系。

二、参加青年军联谊会云大分会

青年军联谊会是国民党国防部于1946年特别组成的一个群众组织，凡有青年军学生的各个学校都成立分会，它直接受国民党国防部和各省省党部的领导。据云大教务处统计，从1946年起至1948年继续分到云大的青年军学生总计有三十余人，实际入学的仅有二十余人。多数来自青年军二〇七师中的驻印军辎重兵十四团，鸿翔部队（伞兵）、青年军二〇五师和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等部队。

1946年秋，云大青年军联谊会分会成立，仅有廿余个青年军学生，组长是政治系三年级学生向镇河，期中后多数同学因停学停教或不愿参加活动，实际上是空有虚名。

1947年秋，云大青年军联谊会分会，又重新组织，参加者有杨柱、王世清、陈汉、谢祖勋、赵嘉孝和我六人，推选出三位理事和监事，我担任监事，并受到云南省党部书记木从规（回族）的接见，会上木从规宣布三件事：①宣读联谊会的组织条例和人会准则，②加强和师大、西南中山中学等联谊会的联系，③征询读书中的困难，向原籍县申请从军优待谷和请发美军剩余物资。后来，我们联谊会活动二、三次，主要是商讨索取美军剩余物资和向原籍请领从军优待谷，此事推我和陈汉同学洽办，我和陈汉多次去平政街三青团总部洽

商，他们被迫不过，只发给我们两根棒球棍，使我们非常气愤，原来他们已把拨给青年军学生们的美军衣服全部私吞掉了。

1948年6月，正是全国反美扶日运动开始之时，省党部又召开云大、师院、中山中学等青年军学生联谊会，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的初级尉官，他们是1944年底从军的第一批青年军学生，1946年退伍时，留在部队担任尉级军官。会上，听取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训话，他说如果发现有青年军学生参加学运者，以叛党叛国论处。余程万这番恐吓的话，使我们大多数既拒绝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一切活动，又不愿参加学运的青年军学生们，无疑在心灵上是个沉重打击。1948年“七·一五”惨案发生后，各校青年军联谊会，便自动解散。

1948年9月，我升入云大文史系文学组二年级，同学只有朱宜初、郑开能和从华中大学转来的余瑛（女）四人，余瑛是我的表姊（云南起义者14军军长余建勋长女）。教我们的都是全国知名教授。其中，有方国瑜、刘文典、白小松、傅懋勉、马曜、李挺等先生。在体育上我被选入排球代表队，在对外比赛中，我多次扑救险球，得到体育老师杨元坤的好感。为了学习诗画，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国画班”和宜初同学组织的“诗社”。在社会活动中，从1948年又参加“保山旅省同学会”。1949年7月我正式参加滇桂黔边区纵队跨入革命队伍。

三、参加云大国画班学习国画

云大西洋画班、国画班和戏剧班是在1948年9月开学后，

由云大教务处组织的。参加国画班的学生有文史系文学组朱宜初、郑开能、余瑛(女)和我,还有外语系的李惠生(女)、罗兰(女)、梅欣生(女)、梅慧生(女)两姊妹、王洪淑(女)、余树仁、木柱等十二位同学,学校聘请了两位国画老师,一位是张静华,一位是阎圃(满族),每礼拜学习两个晚上,全班师生虽来自各系,却十分和睦,常常组织起来到海埂、筇竹寺、海源寺等处旅游,心情非常舒畅。

1949年4月20日,是云大每年一度的校庆日,许多校友和来宾都来校参观,学校也为我们国画班和西洋画班的同学,隆重开了一个画展,颇得参观者的好评。晚上,戏剧班的同学还给全校师生表演了京剧《打渔杀家》、《苏三起解》等,活跃了校庆的文化生活。

四、云大“诗社”和我的写作活动

1948年秋,“七·一五”惨案后,国民党即令云大复课,许多同学因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纷纷走向革命道路,我们文史系的同学亦走了不少。我升入二年级时,文史系则分为历史组与文学组,历史组的同学比较多,文学组的同学只有我和朱宜初、郑开能(郑平)以及由华中大学前来插班的余瑛(女)等四人。由于我们共同的爱好,由宜初发起组成云大“诗社”,目的是用诗歌反映民间苦难,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发泄我们对当局的愤懑,深得校内外学友的支持。据我从日记中查明,“诗社”从1948年10月创办到1949年7月止,我们共出刊八期。其中第七期和第八期,则由同仁精选出思想性好,战斗性比较强的短诗,在昆明中正小学马瑞麟(回族)处,

由宜初同学油印50份，分发给昆明各大中学，引起了同学们的共鸣。

“诗社”壁报创办后，诗歌创作最多的是宜初学友，他的诗浑厚有力，具有战斗性。开能则善写七言或五言律诗，有时写新诗。我是在初高中时，就酷爱文学，常试写小诗，以后因从军，足迹遍及印缅战场和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常把军队生活或民间苦难写成诗歌，特点是生活浓郁，时代感强。我公开发表诗和散文最旺盛的时期，是始于“诗社”，也终于“诗社”。但许多诗稿和文章则早已散失，但事隔43年之后，我却在云南省图书馆保存的《中央日报》的《新垦》文艺副刊中找到我用“吧咕”或“云咳”笔名写的诗歌，其中：《昆虫篇》（1949.3.25），《阿萨密底暴风雨，震撼吧》（1949.3.26），《苦难的村庄》（1949.4.11），《野火》（1949.4.19），《强盗》（1949.5.31），《海埂二章》（1949.6.13）。评篇二篇：一篇是《评怒江文丛江之歌上的诗》（1949.5.2.5——5月26日），《读〈对马〉》（1949年5月），散文二篇：一篇是《报复》（1949年6月），一篇是《草原》（连载，1949年6月9日至14日）。其中《阿萨密底暴风雨，震撼吧》是1945年5月，我在印度雷多中国驻印军时，为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残暴而写；《苦难的村庄》是反映二战后衡阳农民的苦难生活；《读对马》是借日俄海军在对马海峡海战中，俄国海军军官虐待自己士兵的故事，借喻国民党军官亦虐待士兵。《草原》是描写中国驻印军士兵反攻缅北的战斗故事。

1948年“社诗”壁报一直是紧密地配合时局和学运进行战斗。记得文史系同级女生旃桂馥在“七·一五”惨案中被

军警逮捕后，酷刑烤打，最后牺牲。我系全体师生在云大至公堂举行隆重追悼。最后由宣代表“诗社”在追悼会上诵颂了《安息吧》（悼旃桂馥同学）的一首新诗，全诗共178行，充满了对国民党法西斯的愤懑和战斗。诗中有两段写道：

“……………

你！安息吧！

一世没有安息，

——现在安息吧，

播下的种子，

是要抽芽的。

埋下的地雷，

始终要爆炸。

我们知道

巴士的狱

是怎样被捣毁的。

我们也知道，

冬天来了

春天是不会远的。……”

诗的结尾是：

“今年的今天，

我们这群人追悼你。

明年的今天，

有千千万万个人来追悼你。

你是

没有死的。

你！

英勇的灵魂
高贵的灵魂！
——安息吧！”

“诗社”第二首长诗是《血是掩盖不了的》，内容是揭露当时反动政府物价高涨，金元券贬值，人民向南屏街中央银行要求兑换半开，而爆发了所谓“1·12”暴徒抢劫中央银行事件，被卢汉枪杀了廿一条人命的惨案，全诗写出了反动政府的腐败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引起了校内师生的悲愤，和社会各界的同情。

“诗社”的第三首长诗《招魂》，是1949年5月4日刊出。由宜初执笔。诗的内容是追悼1945年以来，在学生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如“一·二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惨案，“七·一五”惨案等，全诗近二百行，诗句慷慨激昂，催人泪下。当时，文史系学友张宁生，即对宜初说：“你们的诗社内容非常好，它也代表了第三方面力量对国民党的看法。”

1949年7月末，我被云大地下党保送到滇南游击队，宜初亦被《怒江文丛》编辑马守纯同志和张宁生学友发展为“民青”成员。同年秋，国民党政府实行“九·九”整肃时，他和开能同学怕被反动政权抓捕，先后东躲西藏，之后，郑开能即离开云大，投奔玉溪滇中独立团，宜初则继续荫蔽，参加地下工作，“诗社”办了八期便宣告终结。

我从1948年10月，开始参加“诗社”以来，除积极向“诗社”写稿，同时还向社会上各小报和保山旅省学会写稿。1949年2月开始向省外投稿。第一篇是《辛酸血泪活滇南》，文章分三段：第一段写昆明南屏街“一·一二”中央

银行惨案；第二段写昆明教育界教师的清贫生活；第三段写滇宇边陲不安。稿件寄给上海复旦大学段冥乡友（施甸籍），请他投给《大公报》同年3月21日，收到段冥来函，文章已先刊载于云南旅沪学报》，之后又被《大公报》、《展望》和《同济大学学报》转载。

1948年秋，保山旅省学会恢复，我也为学会办的《沧怒新潮》写稿，并接受编辑郑谦（现云南日报离休干部）学友委托，于1949年3月，写了《青年应如何修养》、《新知介绍》等文章，同年4月又写了一篇《保山叛变前后》，文章揭露原保山县长杨恒刚勾结共革盟屠杀保山各族人民，文中牵涉到有关当时任省参议员的某某，引起了保山人民和旅省同乡人士的很大震动，对杨恒刚和共革盟恨之入骨。4月25日，云大保山学友汪兆鹏前来找我，谓此文影响很大，写得好，可能已触怒某某省参议员，汪并通报消息，说这位参议员准备雇打手干掉我，希我暂时躲避。

其他我还为安庆一办的进步小报写了《故乡》、《清明时节》（1949年3月），《罪恶的角落》、《绿色的草原》（1949年5月）。为《民报》写了一篇《车箱上》（描写一位中国驻印军士兵沦落上海滩头的一个真人故事）。

五、保山旅省同学会的组成

1948年秋，昆明各大中等学校，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各县在昆同学陆续组成旅省学会，借以联合力量强化民主运动。9月，保山旅省同学会在云大至公堂正式组成，选出云大同学林毓桃为会长，我为理事，负责施甸方面在昆大、中学生的联络工作。与此同时，保山旅省学会，又恢复了《沧

怒新潮》刊物。（《沧怒新潮》创办于1945年5月1日，首任总编辑是林毓杉，第二任是林毓桃，林当选为会长后，即由郑谦任总编辑）。

1949年初，在云南地下党的组织下，保山旅省学会筹组“保山旅省学会返乡团”，准备学期结束后，返回保山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武装的工作。为了及早筹集返乡活动经费，旅省学会又安排我和耿德铨、吕思尚等向在昆明军政部门的保山人士进行募捐，当时我们曾向保山人云南财政厅厅长林南园、卢汉军需科长陈经尧等进行募捐。1949年7月，保山旅省学会返乡团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共有一百余个大学、中学生返回家乡，点燃了滇西重镇保山区内的革命之火。

六、奔投“游击武装”的前后经过

1947年9月，我到云大即被安排在西宿舍茅屋与原驻印军同学陈汉、谢祖勋在一起。某天上午，陈汉约我到会泽院后面平房，会见云大青年军联谊分会小组长向镇河，向是原驻贵阳青年军二〇五师的少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员，后是云大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大家寒暄几句后，向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戴若辛（女）与“民盟分子”相处甚密，准备报警备部逮捕她。我一听十分吃惊，戴若辛原是我西南中学初中部女同学，1945年1月一同从军，编入青年军二〇七师，我们赴印度后，彼此失去联系。1946年秋，她退伍后，又被保送到云大电机专修科求学，我沉静地对向说：戴和我是中山同学，她是唯一从军的女生，做人诚恳谦和，绝无此事，向听后不语，之后，我即不愿再见向镇河，但亦没有将此事告诉戴若辛。

1947年10月，全国助学运动刚刚开始，我们文史系一年级新生组织班会时，石再庵同学悄悄告诉我说：班里有的同学告诉他，说我是青年军学生，不能选我为班干部。我听后心里很明白，更感谢他的直言。某天上午在教室选班干部时，也有个别同学提我的名，我感激同学们对我的信任。我向同学们倾吐我内心的苦衷，我公开亮相表明我是青年军学生的身份，并申辩说：青年军学生绝大部分是热爱祖国，拥护抗日，其中只有小部份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他们的确是在破坏学生运动。我处境不好，请别选我担任班干部。这时有部份进步同学，如尹文桂（女）、马维芬（女、回族）、舒仲（舒联寿）、吴维熙、曹明华等，都对我表示同情。此后中文系同学一直和我相处很好。

1947年11月，全市大、中学生助学运动日益高涨，许多同学组织表演、义卖，把收入交给贫苦师生。我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又不敢向学生自治会谈我的想法，只好写了一封匿名信，投入学生自治会信箱内。表示我自愿开车，搞运输，将收入全部赠给学运。事隔数日，自治会即把这封信以海报形式向众公布。事虽未成，但却表明了我的心愿。

1947年冬，助学运动进入高潮，国民党军警时常伺机抓捕进步同学，有天傍晚，就在青云街，公开逮捕云大何丽芳同学，因而激起全市大、中学校师生的愤怒。1948年5月以后，酿成全国大中学生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当时云南大学是大西南后方的“民主堡垒”，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在云大已形成焦点，但在反动政府阵营中，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同情学运，青年军学生内绝大部分同情革命，保持中立，只有极少数为国民党员的青年军学生却

配合反动军警镇压学生。云大50余个青年军学生中有20余个原是云大从军的二〇七师士兵，奉调印度后，与我们一起编入驻印辎重兵十四团，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即复学云大，这部分同学他们是倾向学运；其他20余个中也只有两三个人，顽固到底。其余都采取中立。

从1947年9月到1948年“七·一五”惨案之间。我和陈汉、谢祖勋与几位驻印军学生同鸿翔部队的赵嘉孝等，虽已参加“云大青年军联谊分会”，但从不干预学运；也不执行云大国民党的一切布置。如原青年军二〇五师学生杨柱多次叫我们参加反学运的国民党《红叶》壁报，都被我们严词拒绝。又如原三青团学生为镇压学运，而殴打我青年军同学，后被我驻印军归来的以叶大经为首的并团结起40余个中山中学青年军学生，在该校地下党的支持下和三青团学生展开了搏斗，打掉了三青团学生在学校反动的嚣张气焰。

1948年6月，“反美扶日”运动，逐步扩大，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为巩固战斗堡垒，大多集中在云大会泽院和南菁中学。反动军警亦相应封锁云大和南菁中学。同时非法逮捕云大同学马丽（女）。云大师生闻听后，亦齐集青云街警察分局门口，强烈要求立即释放。7月形势越来越严峻，反动军警逐步缩小对云大、南菁中学的包围，并准备大量逮捕进步同学，云大学生会也组织各系同学，守卫各道校门，严密监视出入云大的身份不明之人。我除参加轮流守卫大门外，还参加学生联合大会和联欢晚会，还听过云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段必贵（段家陵）对“反美扶日”运动的激昂演讲，和向反动军警举行夜间示威大游行活动。

7月初，我在守卫云大校门时，忽然看见校门外白墙上

张贴着一张大海报，明显写着“北京大学三百余名青年军学生，身着印缅远征军制服，扛着大旗，最先走在“反美扶日”运动斗争前列，霎时我热血沸腾，眼泪直流。他们就是同我一起战斗在印缅战场上的原西南联大的亲密战友。同时，还不断传来在上海同济大学的青年军同学熊同舟已被上海警备部通令抓捕的消息，原杭州青中同班同学谢惠（云南大姚籍）等数人，已投奔江北找老共的消息。正在此时，我却在校门口云大学生信箱内，收到一封云南省党部寄来密信，内装表格数张，大意是叫我们联谊会填写云大进步学生出版的壁报名、系名、人名报与省党部。联谊会接信后，非常气愤，这分明是逼青年军学生充当特务勾当，这时我心潮翻滚，回忆我们在驻印军中所受的迫害，回忆“一·二一”惨案情景，回忆闻一多、李公朴两老师的惨遭杀害，我绝不能把渴望自由、民主的同学断送在反革命屠刀之下，我决不能伤害任何一个同学，但我又无勇气将省党部寄的表格，暗地交给杨智勇（我只知他是进步同学，但不知他是云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希望他们能注意到国民党的行动。在夜间，我们在西宿舍茅舍里将此卷表格烧为灰烬。为了躲避警备部和云大国民党部的监视。陈汉和赵嘉孝提前返回云大，谢祖勋前往平政街叔父家暂住，我则推迟到7月12日，返回保山。

回到家乡不久，一天，保山县县长罗展一行来施甸热水塘村视察，知我叔父杨竹铭是县参议员，即拜访我家，得知我与他的长女罗兰是云大同学，便毫无顾忌地谈了他们不满政府的做法和云大“七·一五”惨案的爆发。罗展后任大理专员，1949年12月9日随卢汉一同起义。

1948年8月末，我返回云大，云大青年军联谊会已自